

中国出版史话 新编

方厚枢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ZHONGGUO CHUBANSHIHUA XINBIAN

中国出版史话新编

方厚枢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开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史话新编/方厚枢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649-0257-5

I. ①中… II. ①方…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G23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872 号

责任编辑 贾怀廷 程新晓

责任校对 田 园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41.75

字 数 601 千字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6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宋应离*

方厚枢先生的《中国出版史话新编》历经多年撰写、打磨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将书稿寄给我并嘱我为书作序,我顿时颇感困惑与不安。一来方先生今年83岁高龄,长我7岁,是一位在出版界德高望重的长辈;二来方先生是我国出版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出版史家。我本人虽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三十余年,但对出版史说不上有什么研究,至多是一个出版史研究和出版史料收集的爱好者。鉴于此,甚感力不能及,我婉辞再三,但仍推辞不掉。

我和方先生相识于1996年。那时,为了适应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的需要,我和袁喜生、刘小敏同志曾先后编纂《中国当代出版史料》、《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家研究资料汇编》,在编纂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惑和难题。我们就多次登门求教于方先生,他总是热情接待,不吝指教,我们从中受益匪浅。此后,多年来我们和方先生之间电话不断、书信频繁,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深厚友谊。基于这样的情况,老友情真意切,我只好不揣浅陋,对本书的出版及方先生的治学精神写一点自己的印象和感想。

第一,对出版史的研究起步早是方先生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我国是一个文化发达、出版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记

* 作者为河南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研究员,编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述研究出版历史规律的著作却甚少。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所改变,出版史的研究被人们逐渐认识并重视起来,开始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1953年,张静庐先生经多年努力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出版。继此,一套回顾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出版状况的大型资料图书8册,历时7年至1959年终于出齐。这部出自出版界老前辈之手的大型资料图书可谓出版史料丛书的开山之作,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受其启发,方先生早在1962年就萌发了研究我国出版史特别是当代出版史的强烈愿望。后来他结合工作,注意从多方面像磁铁吸铁和海绵吸水一样,多方寻觅收集出版史料,以“沙里淘金”的精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消化、吸收,历时18年的努力,于1980年试写了《中国出版简史(初稿)》,先在《出版工作》上连载,经过多年补充修改,1996年以《中国出版史话》为书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广泛赞誉。有关专家称此书“是迄今所见第一部下限至建国40周年的通史性质的出版史”。本书不仅在国内赢得好评,2002年11月,日本一家出版机构新曜社将其翻译为日文出版。该书在《译后记》中称:“本书内容涉及从殷商到现代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书中为读者列出了必要的文献、出版统计,年表完备,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书。”

《中国出版史话》的出版为方先生出版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通向出版史研究铺平了一条坦途。在长达近50年漫长岁月中,他的研究领域始终锁定在中国出版史特别是当代出版史这个中心点上,借助出版史研究这个平台,出版了一系列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可以无愧地说,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出版史研究起步较早的先行者之一,也是在这一领域成就卓著的出版史家之一。

第二,追求真是方先生治学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

方先生为人低调,不肆张扬;而做学问则一丝不苟,求真攀高。他常说,研究工作的“起点要低,但研究的成果要向高标准看齐”。出版史的研究离不开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在史料的收集,他认为要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写史、收集史料必须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他很赞成老出版家王益提出的评价史料的标准:“史料的价值,贵在真实。真实的史料才有价值,不真实的史料一钱不值。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是衡量史料价值的标准。”收入本书中有关“文革”中出版方面的一系列文章,由于他于“文

革”10年中,先后在“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局”等单位工作,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有幸收集了许多“文革”中有关出版工作的第一手资料,经研究而写成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都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具体事实,资料翔实真切,给人一种零距离的现场真实感,受到读者和专家的好评。如《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文革”期间“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始末纪实》一文发表后,有专家评论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出版历史,世人知道得很少,有关这段‘动乱’时期出版史料的发表和研究的文章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人已经是很少很少的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始末纪实》一文的作者,可以说是现仍健在的从头到底参加这工作的一位先生。他根据当时的笔记本、记录材料和一些历史文献撰写了这篇文章,其中许多事情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鲜为人知的,弥足珍贵。”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研究“文革”这段出版历史,现实性强,敏感问题多,但方先生坚持求真,他的许多系列文章结集后,经中央权威研究部门审定,认为“记叙的史实比较准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学术研究中的求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必须抱着认真、严谨、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从反复比较鉴别中才能达到求真和有所创新。如他在撰写《中国出版史话》涉及中国最早的书籍时,以往《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不少专家将“韦”释为“熟牛皮绳”,方先生根据古文字家商承祚的研究,认为“韦编”的“韦”为“纬”的初字,应读为横线的纬,不读兽皮的韦。“韦编”即“纬编”,就是竹简上的横编。因此,将“韦编”说成用熟牛皮编是一种误解。这都是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得出的新的看法。

方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遇到拿不准的问题,总是经过自己深入思考后和有关专家商量。2000年初,他承担了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中现代部分和补卷中部分史料的辑注工作,当中收有一篇文章,涉及个别语句的出处问题。文中有“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余嘉锡先生语)”一句。他感到引文出处有疑,经查证史料后给作者写信说:“这两句话源出于唐柳宗元《柳先生集》九:‘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中墓志’内,……‘其书为,

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因此,是否可将‘(余嘉锡先生语)’一句删去。稿中另有个别处,亦请阅后改正。”这位作者回信感谢说:“您订正之处极是,如果我们的编辑都能如您这般认真,中国的图书质量一定会大大提高。”由此,方先生的认真求实的精神可见一斑。

第三,方先生治学方面留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工夫深。

一般说来,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自幼就受到系统的正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具有相当专业基础知识,经过长期努力,在某一领域卓有建树。然而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从小无缘受到正规教育,但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干中学习,走入学术殿堂,同样能取得令人可喜的成就。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他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初中只念了两年就辍学了。1943年16岁的他,经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他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低,底子薄,在工作之余,就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阅读了一大批文史类图书,自学了高中、大学的文史类教科书,等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这为他以后长达几十年的出版工作和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练就了他做学问的深工夫。他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正是凭着他的真工夫,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一个编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一路走来,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方先生在这方面有几点是令我佩服的。

他对出版史的研究及出版史料的收集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热心。在别人看来出版史研究是个冷门,又是个无什么经济效益的差事,但他却认为这是发展繁荣出版事业的需要。所以几十年他乐此不疲,几乎把全部心思融入其中,一直不停步地进行精心研究,并卓有成效。

在治学态度上,他耐得住寂寞,力戒浮躁,有一种不怕坐冷板凳的耐心。他开始研究出版史时,一无复印机,二无电脑查询资料,全靠手勤、脑勤、腿勤,用“笨”方法一个个字抄写资料,有些资料是从废纸堆里拣出来的。他对资料随时留意收集积累。有时为了收集到有关资料,在图书馆、书店查阅资料一站就是几小时,但他总是乐在其中。

在治学的道路上,他有一种自强不息、耕耘不止的恒心。方先生已进入耄耋之年,且健康欠佳,但他珍惜时光从不歇步,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耐力。他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在治学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旺盛持久的后续力。真

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研究不止。不愧为一位令人仰慕的著名出版史家。

《中国出版史话新编》这部 60 多万字的著作共收 52 篇出版史料和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已出版的《中国出版史话》和《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两本文集中没有收的,少量是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经过补充、修改完善形成的,还有少量文章是近年来新写尚未正式在报刊上发表的。本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部中国出版通史,但它对我国古代特别是对当代各个时期的出版活动及重要史实,在文中都有所记述,可以说勾画了中国出版通史的大的轮廓。书后的几篇附录价值尤高。它的出版必将对广大读者有所启发,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感想良多,写了上述几点,如有不妥,请专家批评指正。

2010 年 8 月于河南大学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是我继《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8 月出版)和《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 5 月出版)之后的第三本有关我国出版史的文集。

我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源起于 1962 年秋,我从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调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后,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张静庐先生花费近二十年时间搜集、整理、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在学习、研究之后,萌发了收集、研究我国当代出版资料的愿望,便结合工作,注意从各方面收集有保存价值的资料,直到 1992 年(包括“文革”动乱时期)始终没有中断过。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一年的整顿,从 1978 年起,全国不少地方出版部门陆续建立了一些培训出版、印刷、发行干部的机构。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出版工作》刊物上,有人提出编写《中国出版史》的建议。197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后,收到一些地方干部培训机构的来信,有的信中说:“我们出版部门担负着为各级学校、各专业学科提供教材的任务,可是为自己培养出版事业接班人的教材,却一本也没有。……我们自己动手写,属于业务知识教材还可应付,但一接触到‘出版事业史’的教材就束手无策了。我们拥护《出版工作》上发表的建议,请你们迅速组织力量付诸实施,以应燃眉之急。”

中国版协副秘书长(时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倪子明同志收到信后,他了解我已多年收集出版资料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出版史料文章,便向我建议是否可以试试。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学识水平有限,未敢贸然答应。我说,张静庐先生 1958 年后,在继续收集整理中国出版史料时,还计划编写

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并做了充分准备，编了大量卡片，但一直到他1969年9月病逝时也未能实现，可见此事之难。子明同志说，现在的情况已有变化，并已具备了一些有利条件。他对我谈的黄洛峰同志讲的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的是1958年11月，文化部直属的文化学院开学后，出版、发行工作没有教材。担任院长的黄洛峰同志就组织学院开办的出版、发行研究班的学员自己动手写。开始时学员感到编书一无资料，二无前人著作参考，有畏难情绪。黄洛峰鼓励他们说：

正因为没有前人著作，才有编书的必要。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写，又靠谁来写呢？我们干出版工作的时间都不短了，大家的实践经验就是丰富的活资料，也还有一些文字资料可以利用。

他鼓励学员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有“第一人吃螃蟹”的勇气。第一稿不一定令人满意，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反复补充修改，就能逐步完善，成为一本好书。

当时，我已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界和印刷界都已有专家写了多部中国书史、印刷史出版，而明确以《中国出版史》为书名的专著却一部也没有。在子明同志的热情鼓励下，我就是抱着“第一人吃螃蟹”的勇气，从整理多年来收集的出版资料入手，拟出写作提纲，从1980年上半年起试写《中国出版简史（初稿）》。从当年9月起，按月在《出版工作》上连载。当时我的想法是：我现在尝试写了第一部，虽然内容粗浅，但有了第一，今后一定会有第二、第三……内容更好的出版史问世。我的《中国出版史话》经过不断补充、修改，于1995年下半年送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道弘同志审阅后，同意列入他主编的一套有关编辑出版的书中，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编的这本《中国出版史话新编》中，共收了52篇文章和资料，大致分为五个部分：

（1）“古代出版史探索”15篇。我用了“探索”之名，就是说其中有大部分文章都是我对古代出版史研究的一些习作，在今天的出版史研究专家看来，会发现有不少不妥之处，但从中也能看出当年我的研究水平。其中有3篇（对古代科技、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是我1961年6月参加新华书店总店成立的“图书发行教材办公室”，负责为书店培训业务干部编写《书籍学》教材中的部分章节，全书大约用了一年时间写成，但在“文革”动乱时期，和

其他几部教材的原稿一起全部散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发表的是我根据手头尚存的草稿并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写成的。

(2)“当代出版工作纪事”14篇。其中大部分文章所记的史实,都是我所亲历、亲见、亲闻的,可以为今天的新一代出版工作者了解那个时期的出版工作实况,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3)“历史回望散记”12篇。都是我在半个世纪以来所写的回忆文章,提供给今天的年轻编辑出版工作者作参考。

(4)“缅怀故人”8篇。都是怀念对我的编辑出版工作有过较大帮助的领导、老师、友人和至亲,以寄托我无限的哀思。

(5)“附录”3篇。为今天的出版工作者提供一些可以查考的资料。

由于个人的学识水平有限,所收文章的内容有不妥之处,殷切期望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作 者

2010年4月8日83岁生日之夜

目 录

序	宋应离 (1)
写在前面的话	(1)

古代出版史探索

中国文字和书籍的起源	(3)
文字的统一和图书贸易的萌芽	(16)
中国最早的书籍	(21)
造纸术的发明	(31)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36)
官府刻书和私人刻书的开端	(45)
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54)
中国古代科技著作的辉煌成就	(68)
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著作	(87)
光彩熠熠的唐代文学著作	(110)
“二十四史”出版史话	(128)
四部古典小说名著出版史话	(141)
中国辞书史话	(157)
中国年画出版史话	(176)
古代出版史话三题	(181)
从目录学入手	(181)

古籍版本谈	(184)
琉璃厂书店史话	(190)

当代出版工作纪事

《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绪论	(195)
牢记“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教导	
——回忆毛泽东、胡乔木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题词和讲话	(209)
新中国图书出版概况(1949年10月至1965年12月)	(212)
建国初期北京市处理反动、淫秽出版物纪事	(249)
新中国中央级出版社60年变迁纪实	(256)
新中国科技图书出版60年	(281)
中国书刊的对外传播	(291)
《郭沫若文集》编辑出版工作会议纪事	
——三十年前一次会议的回忆	(297)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华书店工作纪事	(304)
“文革”时期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出版工作的回忆	(312)
“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书出版概况	(345)
当代中国出版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	
——记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363)
“四人帮”覆灭前的最后一次反扑	
——“文革”十年出版纪事的最后一篇	(373)
“三十春秋梦终圆”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从筹建到成立的曲折经历	(378)

历史回望散记

我的书缘与编辑工作	(389)
-----------------	-------

我了解的商务印书馆若干史事

- 八十回望访谈录 (394)
- 我和三联人 (405)
- 我对儿童科教影片《书的故事》编剧的尝试 (411)
- 两部人名词典编辑工作的回顾 (431)
- “无名英雄”的甘苦
 - 从陈原同志对辞书编辑工作的一件批语说起 (441)
- 听老编辑讲那动人的故事
 - 《编辑之歌》编辑札记 (454)
- 内部书出版发行的历史回忆 (462)
- 新中国出版史研究中有特色的“个案”
 - 薛德震《为他人作嫁衣裳》序 (472)
- 出版史研究著作的新收获
 -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读后感言 (475)
- 我的“文革”经历与当代出版史 (481)
- 为中国出版史研究添砖加瓦三十年回顾 (488)

缅怀故人

- 追忆一辈子为读者奉献精品书刊的编辑家叶圣陶 (499)
- 怀念王益对出版史研究的关注和指导 (512)
- 怀念陈翰伯对我国辞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522)
- 陈原的小屋和他的梦 (535)
- 开创社会主义出版学、重视出版史料出版的先行者
 - 宋原放同志逝世五周年祭 (539)
- 默默奉献的编辑人生
 - 怀念远去的师友王仰晨 (546)
- 回忆叶再生对我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成就 (563)
- “不要忘记过去”
 - 怀念我的大哥、大嫂 (570)

附 录

中国出版的起源和发展大事记(公元前 770 年至 1948 年)	(5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大事记(1949 年至 2009 年)	(6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出版统计(1949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	(649)

古代出版史探索

